

# 《不存在的女孩》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王敬文<sup>1</sup>

(1.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 本文从移民文学视角讨论露丝·尾关《不存在的女孩》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小说以奈绪的英日混写日记与露丝的阅读追索交织推进, 呈现语言杂糅如何标记身份位置, 并在家庭与学校的他者关系中显影创伤经验与归属焦虑; 同时, 日记的漂流结构推动人物在理解与再叙述中重整自我认同。文章指出, 作品将身份问题呈现为持续协商的过程, 为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共存困境与自我重组提供了文本参照。

**关键词:** 移民文学; 跨文化身份建构; 语言杂糅; 创伤叙事; 日记漂流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71

## 引言

移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文学类别, 主要关注移民个体及群体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生存经验、身份认同与文化交融的复杂过程, 它既描绘迁移后的生活图景, 也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多面性。日比嘉高指出研究移民文学有重审边界、探究语言的混合性与与他者接触和共存三重价值。<sup>[1]</sup>强调移民群体往往处于文化边界的连接位置, 其双重身份既带来资源与可能, 也造成游离与紧张, 使身份认同更常表现为在主流社会与原生文化之间的持续协商。

日裔美国作家露丝·尾关的作品《不存在的女孩》以被海浪冲上岸的日记为叙事枢纽, 将从美国回到日本的少女奈绪的自述与加拿大日裔女作家露丝的阅读追索交织起来, 使跨文化处境在讲述与理解、记录与翻译的往复中持续地展开。<sup>[2]</sup>

本文将《不存在的女孩》置于移民文学脉络之中, 讨论作品如何通过语言混合的书写、家庭与学校关系的压力结构以及叙事结构等意义资源的调动, 呈现全球化语境中移民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

## 一、语言杂糅与身份建构

《不存在的女孩》中, 奈绪的日记以英语为主要书写媒介, 这一选择首先对应她在美国成长的语言习惯, 也把她回到日本后的疏离感与不适感直接呈现在文本表层。英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奈绪作为文化外来者的处境, 而日语短语与词汇的穿插则常被用于承载情绪与特定文化概念, 显示她仍试图保留与日本文化的联系。语言的选择并非中立, 具备多语能力的人选择某种语言中的某个词往往出于特定原因。克里斯汀·沃尔德指出, 在很多情况下, 语言选择会成为自我定位的一种资源。<sup>[3]</sup>少数族裔在话语中插入某种语言成分, 使其身份的特定侧面在交际情境中变得相关, 从而提示与该语言相联系的归属与位置。

日语成分的插入首先集中出现在强情境的社会互动中, 尤其是那些预设角色分配与礼貌秩序的场景。比如女仆咖啡厅的迎接用语可译为“欢迎回家, 主人”, 这类敬语化称谓并不只是场景装饰, 而是将服务关系的脚本直接写进语言, 把奈绪置于被规训与被观看的位置。类似地, 陌生人上门询问父亲时使用的礼貌询问语“打扰了, 请问父亲在家吗”, 它展示着日本社会交往中对距离与身份的精细调节。奈绪在叙述中保留这类表达的存在感, 呈现她对礼节尺度的迟疑与不适, 语言成为她进入日本社会规则时的第一道门槛。

更能体现语言与归属绑定的, 是对固定寒暄语的处理。文本写到一种常见出门寒暄语可译为“我出门了”, 以及对应回应为“路上小心”, 奈绪却无法顺畅完成对答。此类固定寒暄语在日常语境中隐含着会平安返回的承诺, 当家庭处于不稳定状态时, 这种承诺失效, 语言便出现卡顿。奈绪说不出口的回应, 既标记了家庭秩序的裂缝, 也让读者看到她并非不懂规则, 而是在规则失去现实支撑时失去了进入其中的信心。

除句子层面的插入外, 日记还保留了大量日本社会与文化专名, 尤其是“归国子女”这一称谓, 本身就携带社会目光与标签化机制。奈绪在叙述中保留该称谓的存在感, 相当于把外部命名方式一并纳入自述, 使她的处境既

**作者简介:** 王敬文(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

被命名也被反思。换言之，文化专名不仅指称对象，更携带社会评价的重量，使身份问题从内心感受落到可被辨认的制度性位置上。

因此，语言杂糅在作品中构成一套持续运作的身份标记机制。英语的主导使奈绪的美国经验始终在场，日语成分的插入则在关键处把她拉回日本社会的礼貌秩序与文化语感，两者交错使她既难以回到单一的美国身份，也无法被动完成对日本身份的同化。语言在这里既是表达工具，也是位置声明，跨文化身份建构由此呈现为一个可被追踪的过程，它不依赖一次性的融入或决断，而是在每一次言说与被言说之中反复生成。

## 二、与他者接触与共存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

日比嘉高指出，身份认同是在与周围关系的缔结中逐步构建的，个体在家庭与地区的人际交往、学校教育以及可利用的话语资源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完成自我认同的生成与调整。

当移民并不受欢迎，甚至遭遇排挤与攻击时，与他者的接触就不再只是日常交往，而会变成一套把人推向边缘的位置机制。斯图尔特·霍尔在讨论移民群体身份时指出：“文化身份不是等待被发现的本体，而是在表述中不断生成的定位。”<sup>[4]</sup>因而移民经验的意义并不等同于归属的缺席，是迫使主体在差异中不断重新命名自身。《不存在的女孩》对这一过程的呈现并不抽象，它把奈绪置于父母、同学与老己子三类他者关系之中，表明文化身份并非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次次接触、受伤、回避与重新学习共处的过程中被迫调整出来的。

回到日本之后，奈绪首先面对的是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形。父亲在美国遭遇挫败后返日，无法重新适应日本社会的文化环境，他的失业与多次尝试自杀不仅是经济压力的体现，更直接撕裂了家庭日常的稳定感。父亲在两套评价体系之间反复受挫，家庭空间由此弥漫着羞耻与无力感，奈绪对父亲既同情又愤怒，亲子之间的接触常常被紧张气氛替代。母亲原本试图充当调和者，却在丈夫的抑郁与家庭困境中逐渐退缩，她沉溺于观察水母，对奈绪在学校遭遇的伤害缺少有效回应，甚至认为奈绪是因为不够努力结识新朋友。

在这种关系结构里，奈绪并不是缺乏沟通意愿，而是找不到可以承接她经验的对象。她的情绪更接近被迫吞咽后的内伤，难以在家庭对话中获得解释，最终只能把那些无法被接住的感觉转移到日记里。

家庭的他者接触因此呈现为一种悖论，亲密关系本应提供庇护，却因为成年人自身的失能而变得不可靠，奈绪的自我定位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偏移，她越来越像被留在门外的人，既无法回到美国式的自我叙述，也难以进入日本式家庭秩序所期待的角色。

学校中的他者接触则更直接地把差异固定为标签。作为归国子女，奈绪回到日本后面临严重的校园欺凌，这不仅凸显她在当代日本社会中的文化边缘化身份，也使她的日常感受被持续推向恐惧与警觉。小说用鬣狗围猎的比喻描写这一过程，“它们从四处逼近，把兽群里最可怜的动物隔离开，包围它，一点儿一点儿收紧……是一只敏捷而卑劣的小鬣狗最先一跃而上，撕开皮肉，血沫横飞。”欺凌者从四处逼近，把她隔离开来，表面上看起来像善意的游戏，实际上却是持续一整天的伤害与羞辱。他们用糟糕的英语唱问候语来嘲弄她，把对身体与气味的污名化当作集体娱乐，反复说出“恶心死了，她闻起来像外国人一样臭”。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以污名概念解释某些差异如何在互动中被转化为可被嘲弄的缺陷，从而使被标记者在公共空间中被迫自我监控并内化羞耻。<sup>[5]</sup>小说中同学对奈绪气味与身体的攻击正是把文化差异具体化为污名的过程。

这一类语言暴力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把奈绪的身体当作可任意评判的对象，使她在公共空间里难以保有最基本的尊严感。更重要的是，伤害并不止于当下的疼痛，它会在叙述中留下痕迹。奈绪反复回到逼近的路线、围观的目光、身体的割伤与瘀青，细节被一遍遍写下，这种重复更像是经验无法被顺畅整合时的一种停留方式。创伤在这里不是被提出来的概念，而是通过叙述的固着、情绪的骤变与对细节的执拗再现被写出来的，奈绪的身份也因此被迫收缩成外来者与被驱逐者的形状。

不过，作品没有把奈绪的文化身份固定在被排斥的终点。与老己子的接触为她提供了另一种共存关系。奈绪明确说过，如果己子没有教她怎样养成超能力，她可能早就死了。这里的超能力并不是奇观式的设定，更像是一种在痛苦中保住自我边界的生活技艺，它让奈绪从只能被动承受的状态里稍稍退开一步，重新获得应对的可能。老己子作为家庭中的长辈，提供的不只是陪伴，更是一种把个人经验重新放进家族记忆与文化传统之中的路径，使奈绪在与长辈的日常相处里重新理解家庭与文化。

当学校将她不断推出共同体时，老己子却以另一种方式把她拉回关系之中，奈绪的身份由此不再只是被命名的归国子女，也出现了能够主动理解自身处境并重新安放的空间。

## 三、日记漂流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

《不存在的女孩》并不把跨文化经验当作人物设定的背景板，而是把它写进叙事机制之中。奈绪的日记被海浪带到异国海岸，被露丝拾得并进入她的日常生活。两条线索因此不是简单并置，而是在同一本日记的牵引下相互咬合。奈绪的书写原本是对当下困境的自救式记录，但当日记落入另一位日裔写作者手中，书写就不再只是自我倾诉，它开始自动具备面向他者的属性。跨文化身份建构也因此从人物内心的独白，转为一种通过媒介发生的关系过程。身份在这里不是先被确立再被叙述，而是在被阅读、被追索、被理解或被误解的往复中逐渐显形。

露丝的阅读过程让这种协商性更为具体。她对日本文化的认知并不完整，许多细节既熟悉又陌生，日记里出现的日常表达、习俗线索与历史记忆不断触发她的停顿与回查。她需要查资料、找人确认、反复对照语境，才能把日记的意思拼接起来。正是在这些停顿里，露丝的身份被迫从默认状态转为自我审视。她意识到自己既不是“完全的外部读者”，也无法回到一种纯粹的原乡位置。日记把她拖进一个中间地带，她一边以北美生活经验来理解奈绪的处境，一边又在语言与文化细节处不断碰壁。碰壁并不等于失败，恰恰相反，它让露丝看见所谓归属感并

非来自知识的完备,而来自在陌生感中仍愿意持续靠近的关系姿态。露丝在阅读中逐步重整自己的家族记忆与文化位置,她对奈绪的追索也是对自我的追索,跨文化身份因此表现为一种被动卷入又主动回应的协商过程。

奈绪一侧的身份变化同样通过日记得以呈现。前两章写到她在家与学校里反复受挤压,差异被放大为污名,亲密关系无法承接她的求助,公共空间又不断向她投射敌意。在这种处境中,日记最初更像一间密室,容纳她无法说出口的羞耻、愤怒与恐惧。但随着书写的推进,日记逐渐从密室变成通道。它把经验整理为可以被他人看见的叙述,把碎片化的痛感转化为可被指认的事实,让她至少在纸面上重新获得命名自身处境的权利。日记在这里不只记录伤害,也承担整理生活的功能,它把她从只能被动承受的位置上稍稍拉开,使她开始重新安排自己与家庭、与语言、与文化的距离。跨文化身份因此不是被外部标签框死的结果,而是在持续调整中生成的自我定位。

两条线索最终在日记这一媒介上形成回路。奈绪写下日记时未必知道会被谁读到,但日记的漂流让她的叙述获得了现实中的听者。露丝并非只是在阅读一个故事,她的阅读本身构成对奈绪存在的确认,也构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再组织。奈绪的书写让露丝重新触摸那些断裂的文化线索,露丝的阅读则让奈绪的书写不再只是孤独的自言自语。两人隔着海洋与时间,却在叙事结构中互为他人。跨文化身份建构正是在这种互为他人的关系里完成的,它不是线性地从某一端走向另一端,而是在理解与误解、接近与退避、被命名与重新命名之间反复移动,最终呈现出一种动态而开放的自我组织过程。

## 结语

《不存在的女孩》所呈现的跨文化身份建构并非静态归属,而是在失衡与调整的往复中逐渐形成。奈绪以英语书写并夹杂日语,语言的摇摆对应她在日本社会中的疏离感与自我定位;家庭失序与校园排斥将差异推向伤害,使创伤沉入日常并反复回返;与老己子的相处则提供了新的共存关系,使她在被驱逐的现实中获得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

小说通过日记漂流与露丝的阅读,将身份问题推进到跨地域的理解关系之中。书写在被阅读时获得回应,阅读在追索中重整文化记忆,两条线索彼此牵引,表明跨文化身份并非二选一的选择,而是在语言实践、他人关系与叙述重写中持续生成的自我位置,并由此凸显移民文学对于理解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边界与共同体关系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作品把身份问题从单一文化归属的回答题转向持续的关系实践与伦理选择,同时也提示移民文学可以在叙事层面提供理解他者与重建共同体感的路径。

## 参考文献:

- [1] 日比嘉高著,魏晨译.日裔美国移民日语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2),1-16.
- [2] [美]露丝·尾关著,袁田译.不存在的女孩[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3] Lexander, Kristin Vold. "Analyzing multilingual texting in Senegal: An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mixed-language SMS." *Language mixing and code-switching in writing*. Routledge, 2012. 146-169.
- [4]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s*

Jingwen Wang<sup>1</sup>

<sup>1</sup>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cultural identity in Ruth Ozeki's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s*. Interweaving Naoko's diary written in a hybrid form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with Ruth's reading and pursuit, the novel reveals how linguistic hybridity marks one's identity position, and how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anxiety of belonging are manifested in the other-oriented relationships within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Meanwhile, the drif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diary propels the characters to restructure their self-ident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re-narr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ork portrays identity as a process of constant negotiation, providing a textu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dicament of cross-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self-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Immigrant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Hybridity; Trauma Narrative; Drifting Diary